

从斯皮瓦克的后殖民主义解读《我母亲的自传》

周卉梅

(苏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6)

摘要:作为后殖民主义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斯皮瓦克指出了“属下”不能发声这一事实,同时将女性主义融入到自己的分析之中,揭示了殖民地女性所遭受的帝国与男性霸权的双重权利话语的压制。运用斯皮瓦克的后殖民理论,分析了《我母亲的自传》中,主人公雪拉和她的妹妹,作为属下所遭受的压迫,同时分析了主人公自身意识的觉醒,对两种压迫奋起反抗,寻求一种自我的独立。

关键词:斯皮瓦克;后殖民主义;属下;《我母亲的自传》

中图分类号:I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322(2013)02-0073-04

后殖民主义理论是跨学科的文化理论和文化研究的一部分,综合了人类学、社会学、文学批评、历史、心理研究、政治科学和哲学等的理论来考察不同的文化文本和文化行为。对于后殖民理论的研究范围,道格拉斯·罗宾森归纳了在理论界盛行的3种看法:

(1)已经获得独立的欧洲前殖民地研究,考察欧洲的殖民地在独立后如何回应、适应、抵抗或克服其在争取独立过程中殖民主义的文化残余。“后殖民”在这里指的是殖民统治结束后的文化遗产。其历史阶段大致开始于20世纪的下半叶。

(2)欧洲殖民研究,针对欧洲前殖民地沦为殖民地以后的状况所作的研究,考察欧洲前殖民地沦为殖民地以后如何回应、适应、抵抗或克服殖民文化遗产。在这里,“后殖民”指的是殖民统治开始后的文化。它所涉及的历史时期大致始于16世纪到现代。

(3)所有文化/社会/国家/民族与其他文化的权利关系的研究:研究作为征服者的文化如何随意歪曲被征服者的文化;被征服者的文化如何回应、适应、抵抗或者克服殖民文化的高压统治。在这里,“后殖民”指的是我们在20世纪末期对政治和文化权利关系的看法。它所涉及的是整个人类历史^[1]。

本文中的研究主要运用的是第三种定义。

一、琴凯德与《我母亲的自传》

牙买加·琴凯德,1949年出生于安提瓜,原名为艾莲·波特·理查森。在16岁那年,她移居美国,在纽约上流社会家庭做女佣,并将名字改为牙买加·琴凯德,同时断绝了与家人的一切联系,独立开始了自己在美国的生活。从1976年开始,琴凯德成为《纽约客》杂志的定期撰稿人,发表了多本著作,如《安妮·约翰》(1985)、《露西》(1990)、《我母亲的自传》(1996)和《我的弟弟》(1997)等,成为美国当代重要的作家之一。美国评论界时常将其与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沃尔·索因卡、德拉克·沃尔科特、托尼·莫里森及奈保尔等相提并论。美国当代最知名,最具影响力的批评家与作家苏珊·桑塔格曾经说过:“当代英语作家中,我想读的没几个人。只有琴凯德的作品,是我一向想要读的。”

《我母亲的自传》,虽然篇幅不长,却让琴凯德耗费5年之久,在文学界赢得了广泛的认可,被人们认为是她最好的一部作品。《我母亲的自传》将故事的背景设在加勒比海岸先后被英法两国占领现为英联邦成员国的多米尼克岛国。全文用充满忧伤的笔调和优美的文字讲述了来自加勒比海地区的黑人后裔对于殖民主义时代的痛苦记忆和历史梦魇。这部作品带有浓厚的自传性的色

收稿日期:2013-01-15

作者简介:周卉梅(1989-),女,江苏盐城人,硕士生,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彩,但琴凯德在标题上却用了一个悖论的搭配,“我母亲”和“自传”。在书中,对于“我”即雪拉一生的描写占了几乎所有的笔墨。“对于我的生活的叙述,已经成为对于我母亲的生活叙述,而这也就等于对于我的生活的叙述。即使这样,它又是对于我没有生下来的孩子的生活的叙述,这也是他们对于我的叙述。”“我”是前人的复制,而后人也将是“我”的复制,雪拉只是整个殖民历史中的一个代表。琴凯德作为“少数话语”(minority discourse)的代言人,在这本著作中描写了一个历经殖民铁蹄践踏的幸存者对于殖民者的愤怒、控诉及顽强的抵抗,谱写了一曲殖民地女性的反抗之歌。

二、斯皮瓦克及其后殖民主义理论

佳亚特里·斯皮瓦克于1942年出生于印度,是当今世界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同时也是西方后殖民理论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斯皮瓦克早年师承美国解构批评大师保罗·德曼,获得康奈尔大学博士学位,在20世纪70年代曾以将解构大师德里达的《论文字学》引入英语世界而蜚声北美理论界,后又以演讲的雄辩和批评文风的犀利而驰骋于80、90年代的英语文化理论界。在多年的学术生涯中,斯皮瓦克同时注重有关帝国主义和国际女性主义的历史研究和文学批评;在实践中,她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解构主义者”。斯皮瓦克的《属下能说话吗?》和《三个女性文本和一种帝国主义批评》两篇论文,集中体现了她的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的观点,揭示了第三世界的妇女所受的双重权利话语的压制,即帝国与男性的霸权话语的压制^[2]。

在斯皮瓦克的理论中,一个重要的概念是“属下”(subaltern)。“属下”这一概念通常是指来自西方霸权结构之外地区的人民。属下理论由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葛兰西在《狱中杂记》中首先提出,指代意大利南方的农民;之后,这一概念被“印度属下研究小组”的历史学家们继承和发展,用来描述在南亚大陆被“边缘化”的,非主流的城乡广大的劳动者和中间阶层。斯皮瓦克在其论文《属下能说话吗?》中对这一概念作了进一步的阐释和扩展,指出了属下不能说话这一事实。在此文章中,斯皮瓦克通过对印度古老习俗——寡妇殉身的分析,驳斥了帝国主义话语和男权话语对

殖民地女性的话语侵犯。

印度寡妇登上已故丈夫的火葬堆以身殉夫,这就是寡妇殉身。这个习俗并非普遍流行,也不固定于哪个种姓或阶级。英国人废除了这个习俗,一般认为是“白人正从褐色男人那里救出褐色女人”的一个例子。……与此相对的是印度土著保护主义者的论点,即对怀恋已失根源的一种戏仿:“妇女实际上想要死。”^[3]

在斯皮瓦克的眼中,“人们从未遇到关于妇女声音一意识的证据”。英国早期殖民者将“寡妇”的一词的传统写法 sati 改为 suttee。Sati 的原意是“好妻子”,而 suttee 则有“忠诚”的自焚殉夫的仪式之意。这种误译和篡改产生了一种误导,即只有自焚殉夫才是忠诚的。殖民主义者的主观臆断和篡改给第三世界妇女造成了话语的压抑。在本土文化中,印度本土话语认为,如果妇女不在丈夫逝世时进行自焚,那么她的肉体将永远得不到解脱。这对女性实施了精神上的压迫,表现出了印度本土在这一习俗上所表现出的男权中心主义。“在双重的权利话语的压制和模塑下,第三世界的妇女,只被自我牺牲的意识形态所迷惑和占有,从而发生了眼中的自我错置和误认。”^[4]在这双重的压迫之下,妇女丧失了主体地位而沦为工具性客体,丧失了自己的声音和言说的权利,仅仅缩减为一个空洞的能指而成为帝国主义和父权主义强大的反证。

三、《我母亲的自传》的后殖民解读

在《我母亲的自传》中,主人公雪拉,作为“性别属下”和“民族属下”,首先遭受着父权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雪拉的父亲并不因为她母亲的去世而疼爱这个女儿,而雪拉母亲是加勒比人这一事实又使她遭受他人的嘲笑和压迫。

“我的父亲带上我,将我交给他出资雇佣的为他洗衣服的那个女人照看。他很有可能对她强调过那两个包裹的不同:一个是他的孩子,不过不是他在这世上唯一的孩子,而只是迄今他和唯一同他结过婚的那个女人的唯一的孩子;另一个就是他的脏衣服。他势必会更小心地对待其中的一个包裹,势必会对其中的一个包裹进行更仔细的吩咐,势必会希望其中的一个包裹能得到更好的照料。但究竟是哪一个包裹,我可不清楚,因为他是一个自视甚高的人,他的外表对他来说相当重要。我只清楚,我是他的一个负担。”^[5]^[2]

在父亲的眼中,雪拉只是和他的那些脏衣服一样,被扔给他雇佣的女人尤尼丝照看;而且在雪拉的眼中,似乎衣服对父亲来说显得更为重要,因为他的外表对他极其重要,而她只是他众多孩子中的一个,无足轻重。被寄养在尤尼丝那里,雪拉受尽了辱骂和体罚。雪拉7岁时父亲再婚并接她回家,但继母给她带来的并不是温暖,而是更深的压迫,甚至是死亡的迫害。她渴望得到父亲的爱,因此她给父亲写信,称他为“我亲爱的爸爸”,可是这些信并不是写给现实中的父亲,只是给她想象中的父亲。在父亲的无视中,雪拉经历着折磨。到后来,父亲甚至将雪拉当作商品一样,把她送给拉巴特先生充当生殖的工具。从出生到最后,雪拉都只能在父亲的安排之下,从事着各种活动,不管是幸福的还是不幸的,而却从来没有机会向父亲表达出自己的意愿,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声音”。在父权的世界里,她是一个属下,她不能发声。

雪拉所受的父权的压迫只是一个方面,更多的压迫是来自殖民者帝国主义的压迫。雪拉的母亲是加勒比印第安人,父亲是红毛苏格兰人和非洲女人所生,雪拉是殖民主义的瑕疵,遭受着种族的歧视。雪拉非凡的记忆能力被她的老师称为“是罪恶的,说我被恶魔附了体,而且毫无疑问地就可证实这一点——她再次指出了我的母亲是加勒比人这一事实”。就因为这一种族的渊源,雪拉被人歧视。即使在本土文化中,也是毫无地位可言。与此同时,殖民者的教育和统治在无形中给殖民地的人民刻上了被殖民的印记。

“我用的是英语,而不是用法语方言或者英语方言说的这句话,是地地道道的英语,这本应该是个奇迹:不是我说了话,而是我说了英语,一种我从没听别人说过的语言。尤尼丝妈妈和她的孩子们都说多米尼克语。……我竟用我将永远不会喜欢不会热爱的一个民族的语言说了这第一句话……”^{[5]5}

雪拉开口所讲的第一句话竟然是殖民者的语言,而这显然不是她的祖先用过的语言。“在使用这种语言的同时,却一次次确立了被征服者的身份,每说一句,被征服者的烙印都在无形之中被加深了。”^[6]在殖民者的统治之下,加勒比民族已经丧失了自己的语言。在雪拉的学校里,她们所穿的制服是“从另一所相距遥远的学校的制服上模仿来的”,学校的地图挂着的是“大英帝国”,而这也是雪拉第一次学会念的文字。雪拉的继母也

企图通过语言将雪拉非法化。继母和雪拉说话时用的是法语,在雪拉看来,这是“将我同那种被看作非真正的人拼凑起来的语言联系在一起,那是一种影子人,一种永远屈辱,永远低下的人。”在本土,自己民族的语言却被认为是非法的。殖民者语言上的压迫剥夺了殖民地人民发声的权利。

殖民主义也剥夺了殖民地人民内心的信仰。当殖民地被征服的人民开始相信殖民者所信仰的上帝时,他们便失去了自己文化所特有的内在的信仰,他们便不再相信自己所看到的东西。在雪拉上学的途中,她和自己的伙伴们亲眼目睹了一个漂亮的女人引诱他们的伙伴导致其溺死这样一个事实。但是他们所受到的教育却使得他们不能够相信自己眼睛。

“假如我们受到的教育是成功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不会相信自己亲眼目睹到的这件事情。说我们看见那个男孩游向了一个水果环绕的女人,然后消失在澎湃的激流中,就等于说我们是生活在不可能得到救赎的黑暗之中。无论彼时还是此刻,我都是不可救药的。”^{[5]38-39}

殖民者的教育让雪拉的伙伴们学会了去否认他们所看到的事实,只有雪拉坚持自己所看到的和所听到的,但是她的父亲却不相信她。在这里,殖民者的教育将他们的思维加在了本土人民的思想上,使他们不能有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不能表露自己内心的声音。

雪拉还受到了作为殖民者的拉巴特夫妇的压制。在拉巴特的妻子莉莎的眼里,雪拉只是一个工具。她为雪拉擦干潮湿的身体,为她弄来食物,却仅仅想欺骗和利用雪拉,把她沦为工具,给她生一个孩子。而拉巴特只是想占有雪拉的身体,却不是一个心怀爱意的男人。在他们夫妇的眼中,雪拉,只是他们根据自己需要找的一个工具,而不是作为独立的人或者说女性而存在,她不能有自己的意愿和思想。

不仅是雪拉,她的继母所生的妹妹,也遭受着父权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双重压迫。就因为她的妹妹是女性,所以她的父母对她视而不见。

“她的母亲对她视而不见,因为她的存在是一个巨大的浪费,她不是应该活着的那个人。她的父亲也从来没有真正看过她一眼;不论是在他的儿子死前还是死后,他看她都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她的母亲现在总是以沉默向她示意。她的父亲则继续对她不理不睬。”^{[5]93}

不管在继母所生的弟弟死前还是死后,雪拉的妹妹都是被父亲忽略的对象,没有自己独立的意识。而继母在弟弟死后,对雪拉的妹妹的忽视更见一斑,认为应该死的是雪拉的妹妹,而不是弟弟。即使在本土的环境下,在一个家庭里,雪拉的妹妹作为女性也成为了父权中心主义的属下,不能发声。

雪拉的妹妹也受着殖民主义的压迫。雪拉的妹妹在摔成残疾后,面对雪拉的同情和照料,所表现出的是冷漠和怀疑。雪拉的妹妹并不喜欢雪拉,甚至可以说是讨厌,就如同雪拉不承认她是自己的妹妹一样。可是,在她们的父亲入殓时,雪拉却被允许为他挑选衣服。在雪拉看来:“我妹妹之所以将这一荣耀让与我,是因为我的婚姻使我跻身优越的地位:菲利普属于征服阶级。她对我自己的这种征服深感敬畏——她就是这样看待我的婚姻的——并因此更加鄙视我了。”^{[5]173}

雪拉的妹妹因为忌惮于雪拉的婚姻给她带来的优越地位,虽然自己内心有一千一万个不愿意,却也只能敬畏雪拉现在的地位和身份。她自己内心清晰无比:雪拉现在是征服阶级的地位,而自己却是被征服的阶级。在这样一个境况下,她是属下,是不能发声的。

参考文献:

- [1] Douglas Robinson. Translation and Empire[M]. Manchester: St. Jerome. 1997:14-15.
- [2] 章辉. 斯皮瓦克的后殖民理论[J]. 甘肃社会科学, 2010(5):39-43.
- [3] 罗刚, 刘象愚. 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140.
- [4] 于文秀. 斯皮瓦克和他的后殖民女权主义批评[J]. 求是学刊, 2005(4):87-92.
- [5] 路文彬. 我母亲的自传[M].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06.
- [6] 丁丽芳. 后殖民下的“孤独”书写——浅析牙买加·琴凯德的代表作《我母亲的自传》[J]. 青年文学, 2010(10):106-108.

A Study of The Autobiography of My Moth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ivak's Postcolonial Theories

ZHOU Hui-me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Jiangsu 215006, China)

Abstract: As one of the most prominent figures of postcolonial theories, Spivak has pointed out the fact that subaltern cannot speak. Spivak also applied feminism into her analysis, revealing the double discourse oppression females in the colony suffered. This essay applied Spivak's postcolonial theories to analyze the oppression Xuella and her sister suffered as subalterns. At the same time, the essay analyzed the consciousness awakening of the heroine to resist the oppression and seek to be self dependent.

Keywords: Spivak; postcolonial theories; subaltern; The Autobiography of My Mother

(责任编辑:李开玲)